

## 一次跨文化实践：记云南中医西传博物馆

贺 霆

预计于2012年上半年开幕的的中医西传博物馆（原拟“中医西传人类学博物馆”，后恐“人类学”一词尚不为官员理解故略去）隶属云南省中医药暨少数民族医药博物馆，坐落在云南中医学院昆明呈贡新校区。它可以被看做是一座以医药为专题的博物馆，具有保护文化遗产（针灸已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功能——当然它关注的是西方社会里遗留的、鲜为（国）人知的那部分中医文化。不过，该馆对中医西传当下的表现同样感兴趣；同时，不但将此以民族志的形式展现，还将以人类学方法加以研究，从而揭示西方文化对中医解读、重组、扬弃的规律；所以它更是一座人类学博物馆，并且是革命性的：将一直以研究者出现的西方社会作为人类学标本来展出、来研究，这应该是该馆与国内只关注本土的“民族博物馆”的一个、也是最根本性的差别。建成之后，它将会是国内乃至全世界首个将西方社会文化（虽然只是一个侧面）作为内容的人类学博物馆。

时间回到2011年4月1日下午，法国巴黎Drouot拍卖馆4号厅摆满了法国“针灸之父”苏理耶（George Soulié de Morant）生前财产。苏氏乃传奇性人物，他在中医西传史上举足轻重。他学习中医始于1906年在昆明（即当时云南府）任外交官时，回法后自30年代起教授法国西医生使用针灸，前后共20年，西方社会将中国传统针灸用于临床即以其为开端。这次所拍卖的物件中许多珍贵的中医文物，比如苏氏定做并专用的镶宝石金针9枚。现场拍卖过程曲折离奇，依靠努力、法国朋友的援助特别是上天的眷顾，博物馆将其中最精要者收入囊中，作为馆藏的“第一桶金”。接著，博物馆又获赠大批有关西方中医（主要是针灸）的实物、照片、著作，并录像采访了近20位有代表性的当地针灸名人或普通中医学生，使得中医（针灸）西传的历史得以真实、完整地体现。

自2002年起云南中医学院就对Soulié氏传奇感兴趣，有意建立相关博物馆。去年云南省委托其建立云南省民族医药博物馆并获美籍华人赠款，现主体已建成，其中240平方米属中医西传博物馆。该馆将收集、展出西方国家当地独特

的“中医”器具及使用方法、医理等，而不是“原汁原味”的中医文化（不管是古代收藏，还是当代实践）。虽然苏氏遗物会占重要比例，但展品将不限于此：凡通过其传播（或与其并无关系）而在西方国家出现的、带”中医“标签的各类医疗实践（开创者、方法、实物、原理）都要包容，方显“博物“。博物馆“只述不作”，展示各类西方“中医”实践的原来面貌，既避免科学中心主义解读（迷信、不科学等），也避免民族中心主义解读（异端、不忠实等），同时还须避免殖民主义解读，比如将这些形态各异的“中医”看成是向中华文明高级阶段攀爬的低等文化生物。

除详细的、不带偏见的展出、介绍，举办讲座、研讨会是展品“说话”的机会。惟其如此，方能真正实现现代人类学“美美与共”（费孝通语）之理想：“他者”——包括西方人模仿、想象甚至创造的“中医”——不仅仅像博物馆中的蝴蝶标本供人观赏，还能主动地表述自己，从而让观众从观察对象的角度（而不单从自己文化的角度）认识其行为的合理性。通过建设性的讨论，就能够察觉人类思维 创造的能力，而不会仅仅将这些形态各异的西方”中医“庸俗化地看做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证明、衬托。

中医西传博物馆的意义，还在于为中国人类学发展尝试一条新路。众所周知，人类学一向侧重对非西方社会的研究，而中国人类学界也顺从这个学术格局形成了“过本土化”<sup>1</sup>。近年来中国人类学界对（第三世界）海外社会的研究已有进展，但谈到西方社会研究，反对、疑虑、胆怯者仍众。确实，比起传统人类学研究对象的“海外社会”，对西方社会的研究要困难得多。除去语言、资金等障碍，如何获得“中国视角”是开展研究并取得成功的关键；而当代中国居民（包括或者说特别是人类学者）就像世界其它非西方社会居民一样，“西化”程度严重，无法将西方社会看做“他者”来发现其怪异之处并进行合理化解读。中医西传博物馆不仅在馆藏内容及研究方法上是对传统人类学研究的“革命”，而且以中医为题正好为中国学者提供了这样一个宝贵的视角，能很方便地察觉西方居民行为中的“怪异”之处（相对于我们自己所熟悉的有关中医的“正常”的行为）并展开研究。

中医自上世纪30年代开始了她向西方世界的“跨文化”之旅（这里指的是临床意义上的中医），她在异邦的留下的印迹，今天又将“跨”回故里。中

---

<sup>1</sup>徐新建：以开放的眼光看世界——人类学需要的大视野，《思想战线》2011年第2期

医西传博物馆不仅是中国民众观看西方的一个窗口，更可能成为中国人类学界向西方进军的桥头堡。